

*Articulating Citizenship: Civic Education and Student Politics in Southeastern China, 1912-1940.* By ROBERT CULP.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xvii, 382pp.

關於清末民國時期公民性問題，以及相關領域如道德、思想、教育改革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目之所及不可勝數。而 Robert Culp 在 *Articulating Citizenship* 一書中，特別把公民身份表達的探討，聚焦到1912至1940年江南地區的中等教育和學生運動上。這除了基於政治與教育的密切聯繫外，更是由於作者注意到中學生在表達公民身份上的特殊位置。區別於對重要人物和大規模運動的考察，作者更多著墨於日常生活的變化，提供了頗為新穎的研究角度。

作者首先指出，公民教育的基礎在於建立學生對國家的想象。在民國時期的大量教科書中，近代意義的「中國」，包括在時間上數千年一直延續的政權交替和文化積累，空間上固定的領土和主權，還涉及到一系列的象徵物，如領袖形象、國旗國歌、法定紀念日，等等。其背後都傳遞着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外交利益和意識形態控制等訊息。作者特別提到，在知識界多元甚至混亂的局面下，史地、語文教科書除了在文化、種族上大做文章外，都着力於把中國處理成國語通行、疆界統一的地理實體（geo-body）。這樣比較符合多民族異文化並存的現狀，從而達到最大限度的社會動員。同時，國民教科書中又宣導每個公民都是構成社會的細胞，與國家存在直接的關係，而不需要通過家族組織等作為中介。儘管社會存在種種不平等現象，但仍可通過國家這一最高組織實現民眾的結合。以國家為出發點和最高標準的做法，極大地影響了公民身份的實踐。

作者緊接着重點考察中學生自治團體的活動。在政府短期內無法兌現其政治許諾的情況下，學生自治組織成為地方精英、政府組織以及學生共同認可的政治實踐方式。學生在此過程中不但要移風易俗，更重要的是在政府規定的範圍練習參與政治，為日後成為真正公民作準備。然而與西方傳統自由模式相比，作者指出，教育組織和學生真正表現出的公民身份，更接近道德上的自我管理和無私的社會參與，而不是個體權利的追求和情緒表達。這使得國家利益的表述和政權合法性問題，在公民身份實踐中被反覆建構。

作者還討論了幾次學制變化和學生組織形式如何規範着中學生的生活。頒佈學制，規定中學生的升學方式和修業年限。學校作為新式的社會機構，

通過精確到分鐘的時間控制、空間功能上的明確區分，使學生進入以年齡、班別、具體教學活動組織起來的系統。其細緻的日常管理和功課安排，與傳統學堂呈現出顯著差異。新式學校的道德教育，既保有傳統儒家的忠孝仁義，同時又以條約口岸文化為標準，培養學生的衛生、禮儀和公德意識。作者特別以童子軍訓練為例，描述其在全國範圍的開展如何訓練學生的技能，以及童軍在檢閱與巡遊中發揮的作用。如此既契合國民政府尙武、實行軍事化的主張，又置學生於政府嚴格操控之下。由此可見，教育通過各種方式，使得學生高度參與社會事務，以及建立自我文化意識。

通過還原公民身份表達的種種史實，作者細緻展現了這一歷史過程的吊詭之處。國民黨在很長一段時間是學生公民教育和自治的領導者，而且通過黨化等方式參與其中。這在北伐期間與共產黨為爭取學生而競爭的過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然而，學生過分膨脹的情緒又增加了不安定因素。國民黨當局與學生之間，比單純的對立或合作存在遠為複雜的關係。政府採取的控制措施，包括教科書審查制度、監視學生組織、日常禮儀的規範化，都不可避免地產生消極作用。最明顯的一點就是，原來自發的充滿熱情的學生運動，變成了沉悶的聽受教訓和表達忠誠的儀式。此時共產黨與國民黨左翼的活動卻正好吸納和宣洩了學生的激情，由此從側面反映了國共兩黨政治處境的不同，並隱約預示了合作破裂後局面的變化。

在社會層面上，公民身份實踐與傳統習慣不無抵牾之處。比如人人平等，與尊師重道、孝敬父母之間存在不少距離。即便實踐活動本身亦有諸多自相矛盾之處，如學生一直宣導平等的觀念，卻又把自身放在喚醒民眾的角色上，標榜自己是先進群體。矛盾的情況同樣表現在男女平等問題上，儘管一直被討論和實踐，然而兩性在軍國民訓練中仍被賦予了不同的角色定位。

在篇末，作者把比較的觸角直接延伸到1949年後共產黨推行的公民建設，如鄉村選舉，「同志」稱謂的使用，男女之間無區別化這些現象。目的在於表明，1949年後中國的公民建設與民國時期存在延續性，研究民國時期的歷史有助於了解今天的中國。但這部份不是具體的研究，而且所建立的聯繫之間存在較多的跳躍與空白之處。

在書中，作者始終貫穿着公民意識表達的四個尺度：國家認同、政治參與、社會成員資格和文化公民意識，從而避免了對民國政治過於繁冗的考察，恰如其分地把握了政治局勢、社會變遷與公民身份表達的關係及其變化。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把這一抽象問題建立在扎實的史料基礎上。注釋及參考文獻不單列出了大型檔案資料彙編和目錄，更包括民國時期教科書、學

校年報、校慶刊物、學生社團刊物及報刊雜誌等。作者特別指出，20世紀30年代學生社團受到嚴格監管，因此閱讀這些文本時需要加倍注意。類似對史料的搜羅辨析，為後來研究者提供了不少線索和方法啟示。

本書觀點獨到、史料扎實，實為優秀的研究著作，然而也存在一些可以深化的地方。比如作者很強調學生的衛生、言談等表達公民性的方式，但多作宏觀敘述。通讀全書後，似仍難得出學生以怎樣的日常形象出現在民國社會的直觀感覺，比如言談舉止，衣着禮儀，使得他們自己區別於大眾。此外，書中較少涉及民眾，或者說社會其他群體對學生的反應與感受。有不少資料表明，民眾對學生宣示的觀念或者其活動本身，並非總是積極接受，或受其潛移默化的影響，而是夾雜着批評、貶斥，以及冷漠和距離感。如果能加強這一方面的討論，相信書中的觀點更加符合具體的社會情境。

黎俊忻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China's Jinggangshan Base Area.* By STEPHEN C. AVERILL, with a Preface and Introduction by Joseph W. Esherick and Elizabeth J. Perr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xxxi, 451.

20世紀70、80年代，由於越戰結束以及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影響，國際對毛澤東主義的革命模式的政治興趣逐漸減退，西方學術界對中國革命研究興趣也隨之衰退。政治影響的減弱使西方的中國革命研究更加學術化，其研究主題從「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夠成功」轉為「當時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種主題選擇的變化還與當時史學界的社會史轉向有密切關係。此時的革命史家特別注重將歷史事件放置在具體的時空中加以考察，而不再沉迷於對中國革命的總體研究。韋思諦（Stephen C. Averill）未完成的專著：《高地的革命：中國的井岡山根據地》（*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China's Jinggangshan Base Area*）源自他在1982年所寫的博士論文，自然無法擺脫這場學術潮流的影響。作者對井岡山的研究並未止於這篇博士論文。在之後二三十年的時間裡，他不斷搜集新的資料，進行細緻的研究，反覆的修改，但直至其過世那一刻，《高地的革命》仍未能完稿。慶幸的是在周錫瑞